
十三世紀華北地區的本地精英網絡與蒙古帝國的管治

朱銘堅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本文以《中州啟劄》內二百通書信為中心，重構十三世紀金元過渡時期華北地區漢文人的書信網絡。本文首先呈現了北方不同地區的文人如何通過書信保持聯繫，認為最近有研究提出文人網絡在1234年金朝滅亡後已解體的說法值得商榷，進而探討忽必烈的庇蔭體系以及書信網絡中幾個主要的中介人，如何把部分的文人網絡在1260年以後轉化為本土政治精英網絡，後者繼而促進了蒙古帝國在華北地區的管治。

關鍵詞： 蒙古帝國 精英網絡 忽必烈 華北 書信研究

一、簡介

在不多於半世紀裡，蒙古人締造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他們是如何管理帝國的偌大領土呢？不少歷史學家將蒙古人得以成功維持帝國，歸功於其對資源的有效調度、以及在不同的佔領地上靈活採用當地傳統的統治方法。¹ 在今日的華北地區，蒙古統治精英在漢族士人的幫助下，汲取了所謂的「漢族統治方法」（漢法）而展開了統治。蒙古人把在已滅亡的金朝（1115–1234）領土上生活的人稱為「漢人」，不管他們實際的種族背景是女真抑或契丹。在這個基礎上，我將「漢族士人」定義為學者：（1）其故鄉（原居地）曾隸屬於金朝的管轄範圍之人；（2）實踐傳統學術精英文化之人；（3）受過教育，遵循儒家的基本價值觀和道德標準之人。今人的學術論著已廣泛討論忽必烈（1215–1294，在位：1260–1294）延聘漢族士人及

¹ David Morgan, *The Mongols* (Oxford: Blackwell, 1986), 頁 108–11；John Joseph Saunders, “The Nomad as Empire-BUILDER: A Comparison of the Arab and Mongol Conquests”, 收入 *Muslims and Mongols*, ed. G. W. Rice (Christchurch: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77), 頁 36–66，特別是頁 46–49；Thomas T. Allsen,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Michal Biran, “The Mongo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eppe to Eurasian Empire,” *Medieval Encounters* 10.1–3 (2004), 頁 339–61；與最新近的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eds.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其採用漢族統治方法的原因，² 然而尚有以下問題仍未得到解決：蒙古人是如何招攬漢族士人的呢？後者又是如何設法在蒙古統治下擔任有影響力的職位？通過詳細分析一部尚未吸引學術界關注的書信集，我試圖探索其中的漢族士人網絡在何種程度上有助解明上述兩個問題。

近來，王錦萍提出了一個論點，即在 1234 年蒙古人征服金朝之後，依賴於女真—金國家權力扶持的漢族士人網絡已經消亡。她又指出，與士人網絡相反，非士人社會團體，譬如宗教神職人員、村民和婦女，則在當地社區中形成了網絡，對穩定當地社會貢獻良多，更協助了蒙古在

2 見 Morris Rossabi,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頁 28–36; Herbert Franke,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收入其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4), 第四章, 頁 4–85。有關元朝採用歷代統治中國的王朝行政結構的具體研究, 見 David M. 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0), 頁 1–11; Elizabeth Endicott-West, *Mongolian Rule in China: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頁 3–15。有關為蒙古人服務的漢族士人的詳細討論, 請參閱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 (1200–1300)*, eds.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蕭啟慶: 〈忽必烈「潛邸舊侶」考〉, 收錄在其《元代史新探》(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年), 頁 263–302; 與趙琦: 《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頁 251–97。

中國的統治。³ 與王錦萍藉著山西的證據支持其論證相比，另一位學者王昌偉則專注於關中（今陝西）士人。王錦萍認為漢族士人對蒙古治理中國影響有限，王昌偉則認為在金元過渡之際，關中士人「非常的『官方』導向，許多士人將進入官僚體系視為其終極目標。」⁴ 這些士人並不需要官僚制度以外的空間，他們主張以朝廷為中心的活動和由上而下的政治等級制度，⁵ 這反過來有助蒙古人建立一個以漢族傳統為依歸的中央官僚機構。學術界對金元過渡期間士人的不同學術觀念，表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士人在十三世紀華北地區所扮演的社會、政治或學術思想上的角色。

在金朝滅亡後，士人網絡在多大程度上消亡了？通過檢視一部名為《中州啟劄》的書信集中編錄的兩百通書信，我重構了金元過渡時期的士人書信網絡。⁶ 該書信集

3 Wang Jinping,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 Networks of Literati, Clergy, and Villagers in Shanxi, North China, 1200–1400”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11)。在另一篇最近發表的文章中，王還通過展示 1244 年全真教道觀和全真教信徒的網絡如何促進了大規模道教經典的印刷，探討了宗教網絡在金元過渡時期的文化影響。見 Wang Jinp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reasured Canon of the Mysterious Capital* in North China under Mongol-Yuan Rule,”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4.1 (2014), 頁 1–35。

4 Ong Chang Woei,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頁 206。

5 同上注，頁 76–131。

6 吳弘道編：《中州啟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據清手稿版本翻印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卷 116，頁 1–31。有關《中州啟劄》的彙編和其傳播的討論，請參閱附錄。

是由一位名叫吳弘道（字仁卿，13世紀人）的元代士人所編，其中寫於1301年的序言說明了該集在十三世紀晚期已大致編成，然而序文卻沒有載錄吳弘道收集和出版這些信件的背後動機。至於書信集標題中的「啟劄」，原意是指兩種截然不同的官方文書「啟」和「劄」。「啟」是指正式的問候通信，而「劄」則是指官僚文件，但是《中州啟劄》所收錄的均是漢族士人之間的私人通信而非行政通信。⁷ 在四十八名可識別的撰信人中，⁸ 最為年長的是趙秉文（1159–1232），而最年輕的則可能是劉因（1249–1293）。收錄在《中州啟劄》的書信作者以及收信人皆是漢族士人。在書信集所收錄的兩百餘通書信中，著名士人如趙秉文和元好問（1190–1257）分別只佔了其中的兩通和七通。這與宋代（960–1279）士人的書信集形成了鮮明的

7 這證明了「啟」和「劄」正如十三、十四世紀的百科全書所述，在元代被混而為一而成為當時個人通信的一種形式。見劉應李（1274年進士）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翻印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169冊，卷1，頁18。最近有關「劄」等官僚文件對中國宋代個人信件書寫慣例影響的討論，見Tsui Lik Hang, “Bureaucratic Influences on Letter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Observations from Manuscript Letters and Literati Discourse”, 收入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ed. Antje Richter (Leiden: Brill, 2015), 頁363–97。

8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計算方法與著名的清朝文獻家陸心源（1834–1894）略有差異。陸心源在《中州啟劄》中列出了四十四封信的作者。見陸心源：《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448。主要基於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複製本，我又在陸氏所列的書信作者外再加添了四位：王鶚（1190–1273）、馮璧（1162–1240）、木庵與王儀。

對比，因大部分宋人書信集中的信件均屬於著名的文學人物，如孫覲（1081–1169）、黃庭堅（1045–1105）和蘇軾（1037–1101）。⁹《中州啟劄》所收最多的是著名儒家大師許衡（1209–1281）的書信，共三十三通。繼許衡之後，又有商挺（1209–1288）的十五通和楊果（1197–1271）的十四通，而後二人均是忽必烈政府中的高級官員。

《中州啟劄》所收書信作者皆是當時著名士人這一事實又引伸出許多問題。例如這一系列信件能在多大程度上闡明金元過渡時期的士人活動和精英網絡？而士人網絡的空間分布是甚麼樣的？它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王昌偉曾建議將金元過渡時期的士人納入官僚結構看待。那麼這些信件能否幫助我們了解士人在金元過渡時期所扮演的行政角色？士人網絡在多大程度上與非士人的佛教、道教網絡重疊或相互影響？此外，由於書信網絡中絕大部分士人皆是漢人，他們又是如何與蒙古統治者以及劃分在「色目人」類別之下的西亞及中亞精英有著連結？希望上述問題的答案能有助解決以下這一關鍵問題：漢族士人網

9 有關對蘇軾信件的研究，見 Ronald C. Egan, “Su Shih’s ‘Notes’ as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ourc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2 (1990), 頁 561–88。與 “Su Shi’s Informal Letter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收入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頁 475–507。至於有關孫覲信件的討論，見 Tsui Lik Hang, “How Do You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an Epitaph? A Case Study in Epistol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terati Officials”, 發表於「十至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暨嶺南宋史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嶺南大學，香港，2012年12月9日）。

絡如何促進蒙古人在十三世紀統治華北？

二、士人網絡的空間分布

《中州啟劄》收錄的兩百通信件涉及共四十八位撰信者和六十九位收信者，當中六十七名撰信和收信人的籍貫可資識別。他們籍貫的地理分布表明書信網絡並非局限於一個地區而是遍及華北各地：二十六人的籍貫位於今日河北、十三人位於山東、十一人位於河南、九人位於陝西、五人位於山西、兩人位於遼寧、一人位於江西。此外，士人網絡是動態的——因為撰信人和收信人很少終其一生都留在故鄉，這種動態也影響到士人網絡的空間分布及其範圍。在《中州啟劄》所收錄的書信中，致呂遜（1209–1273）和游顯（1210–1283）二人的最多（超過三十通書信），當中呂遜的動向和書信網絡亦因此有助闡釋這一現象。下引徐世隆（1206–1285）致呂遜的一封信，以使我們對後者的動向有一概括了解：

北渡以來餘二十一年矣，遊從之久又非一日，蓋已熟某之為。與人交，重氣節，輕貨財，決非為利而往者。既而從周君南轅，居一年，又從北旆，久之復南下。¹⁰

¹⁰ 徐威卿：〈與呂子謙參議〉，《中州啟劄》，卷一，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16冊，頁7上。

據徐世隆憶述，呂遜曾與其上司「周君」同遊。在南方逗留一年以後，呂隨周到北方，在北方任事教長一段時間後，呂遜又隨周君回到南方。徐世隆表明這通信是他在北渡二十一年後所寫，這又提供了另一重要線索。徐世隆的墓誌銘謂其在 1233 年蒙古征服河南之後才遷居華北，儘管是次遷徙很可能非出於徐所自願，而是被蒙古人強迫的。按徐世隆北渡之年推斷，可知上引徐世隆與呂遜的一通信撰於 1254 年。¹¹ 雖然信中並未明確說明呂遜在北方曾遊歷何處，但可知呂自 1230 年代至 1250 年南下前，大部分時間均在北方度過。然而呂遜在上述期間曾遊歷過的地方，以及呂的上司周君的身份還懸而未決，為此我們還需參照其他信件。

馮璧（1162–1240）的另一通信，也是其中一通今日倖存最早的寫給呂遜的信，讓我們得知呂遜曾於何時遊歷燕地（今河北）。馮璧曾在金朝奉職，是一位資深的翰林學士。蒙古攻陷開封府後，馮璧遷居山東，並留在該地直到 1236 年，¹² 該信是馮在 1230 年代中期在山東逗留期間所寫。據馮稱，呂遜在較早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近來陪同一名參謀返燕。¹³ 馮璧信中所記載呂遜的活動在某程度上對應了上述徐世隆的描述。餘下的問題是：呂遜在北方停

11 蘇天爵（1294–1352）：《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十二，頁 250。

12 王慶生：《金代文學家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497。

13 馮內翰：〈與呂子謙參議〉，《中州啟劄》，卷一，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3 上。

留了多久？他是在何時開始遷移至南方？以下徒單公履（？-1289）的信件提供了一些線索：

近聞車從有河南之行，已是迴程能一來淇上，作三數月之留，聊遂握手以慰。¹⁴

得知呂遜前往河南的計劃後，徒單公履寫了以上一通信，邀請呂到位於衛州附近的淇探訪他，並在該處停留幾個月。不同的史料均述及徒單在 1252 年秋已搬到衛州，並在那裡開始講學。¹⁵ 這表明此信的撰寫以及呂遜的河南之行不可能早於 1252 年的後半。另一種推斷呂遜何時遷到河南的方法，是去追溯其上司「周君」的活動。正如上面徐世隆的信所述，呂遜是周君的助手，並隨同後者供職各地。雖然周君在《中州啟劄》中給呂遜的三十三通信中經常被提到，但其全名卻從未被透露過。如何才能找出周君的身份？王惲（1227-1304）在一首悼詞中記載了呂遜與江淮都轉運司的關係。一位名叫周惠（？-ca.1261）的官員在 1252 年秋，被指派於衛州附近地區設立江淮都轉運司，¹⁶ 這

14 徒單雲甫：〈與呂子謙〉，《中州啟劄》，卷三，同上注，第 116 冊，頁 17 下。

15 王惲：〈壬子夏六月陪蕭徵君飲方丈南榮同會者烏大使正卿董端卿經歷學士徒單雲甫張提點幾道王秀才子初泊家府小子惲隅侍席末云〉與〈哀友生季子辭並序〉，《王惲全集彙校》，楊亮、鍾彥飛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十四，頁 601，卷六十五，頁 2770。

16 王惲：〈淇州創建故江淮都轉運使周府君祠堂碑銘〉，同上注，卷 54，頁 2476-79。

亦是蒙古大汗蒙哥（1209–1259，r.1251–1259）重建江淮地區，準備進而征服南宋的部分計劃。周惠在入職衛州之前曾在真定任參謀。¹⁷ 高勝舉在另一封信中透露了呂遜所遊歷過的地方。¹⁸ 從周惠和呂遜活動的高度一致性，可推知前者是後者的上司。

上面所討論的書信讓我們粗略地了解呂遜在 1230 年代至 1250 年代之間所遊歷過的地方。在燕地居住了十數年之後，呂遜並未回到其在今日山東的故鄉東平，而是於 1252 年末搬到了衛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呂遜在 1230 年代和 1240 年代逗留河北期間，與在故鄉東平的馮弼和河南的王鶚（1190–1273）通信。當呂遜在 1250 年代搬到河南後，時在河北燕地的王鶚繼續寫信給呂。呂遜和王鶚在 1230 年代至 1250 年代之間的遷徙只是士人在金元過渡期間遊歷的其中兩個例子。¹⁹ 問題是在金元過渡期間，呂遜的遷徙在士人之間有多典型？對於呂遜與周惠經常一起遊歷又應作何解釋？

17 元好問著，狄寶心編：〈信武曹君阡表〉，《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第 5 冊，頁 1028–33。

18 高勝舉尚書：〈與呂子謙〉，《中州啟劄》，卷 3，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18 下。

19 馮內翰：〈與呂子謙參議〉；王百一丞旨：〈與呂子謙參議〉，《中州啟劄》，卷 1，同上注，第 116 冊，頁 3 上至 4 上。

三、士人對官僚服務的看法

眾所周知，蒙古人認為被其所征服的臣民屬於皇親和勳臣的戰利品之一，而這亦是士人和其他人在金朝被蒙古征服後所面對的命運。在《中州啟劄》收錄的 48 位書信作者中，至少有 9 人是金朝進士。當金朝在 1234 年滅亡後，他們失去了作為統治精英養尊處優的地位。與其他被認為是「被征服者」的士人一樣，他們被蒙古強迫向北遷移，成為蒙古領主的徵用勞工。一些俘虜選擇逃亡並成為流民。²⁰ 除了強迫遷移和逃避囚禁之外，士人們在通信中提到，出仕志向也驅使他們遷徙，如下面的信中所示：

天困我輩，未嘗一日得志於世間，故沾沾然
有萬里之舉。²¹

士人之所以渴望長途跋涉來擔當政務並分享被提拔的喜悅，是因為這樣的機會很少。與此前的女真政權相比，蒙古政府高層的民事職位不僅較少，而且競爭激烈。蒙古

20 牧野修二研究了金元過渡時期的社會動盪如何導致士人轉變為囚犯、奴隸或民兵，以及他們如何設法恢復原來的地位。見 Makino Shuji,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ih-jen 士人 in the late Chin 金 and early Yüan 元,” *Acta Asiatica* 45 (1983), 頁 1–26。關於金元過渡期間漢族文人悲慘狀況的詳細討論，見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頁 1–31。

21 陳參議季淵：〈與呂子謙〉，《中州啟劄》，卷三，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17 上。

人以及西亞和中亞精英均對這些職位虎視眈眈，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漢族士人的政治影響力。在 1230 年代至 1250 年代之間，大多數士人難以在朝廷上當高官，大部分只是在蒙古領主或漢人世侯的幕府中任吏職。漢人世侯在華北的不同地區有權管理其世襲的封地。²² 這些漢族世襲領主在金元過渡期扮演了有影響力的軍事、社會政治和文化角色。除了為蒙古軍事行動提供援助外，漢人世侯還招募了分散在中國各地的漢族士人，協助行政機關或在其管轄的地方學校任教，社會秩序遂得以恢復，而漢族文化也得以保留。²³ 漢族士人在 1260 年之前的通信中所提到的

22 溫海清：《畫境中州：金元之際華北行政建置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有關於金元過渡期間華北地區行政管理的新近討論。

23 Igor de Rachewitz, “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Mongol Perio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9.1 (1966), 頁 88–144，同時論述了「漢人世侯」（世襲領主）在華北地區的重要意義。其他關於「漢人世侯」的學術研究包括 Françoise Aubin, “The Rebirth of Chinese Rule in Times of Trouble: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收入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ed. S.R. Schram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頁 113–46; 孫克寬：《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蕭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收入《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213–77，後收入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 265–348；池內功：〈蒙古の金国経略與漢人世侯の成立〉（モンゴルの金国経略と漢人世侯の成立），第 1–4 部分，收入岡本三夫編：《四国学院大学創立 30 周年記念論文集》，（普通寺市：

官名和職位，讓我們認識到他們在金元過渡期間所承擔的職責，其中大多數是行政機構內的吏職。

然而即使要躋身這些次級官僚職位也絕非易事。宋金時期，考試資格越來越受到重視；相比之下，在金元過渡期間，個人聯繫和舉薦是事業發展的關鍵。在《中州啟劄》收集的 200 封信中，有百分之十是士人要求庇蔭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曾在官僚機構服務過的士人會代其親戚和朋友撰寫這些書信，如 1224 年的金朝狀元王鶚在其給呂遜的一通信中便提到以下內容：

表弟韓茂之，閑書筭，為趙相和糴官、倉官數年矣，今茲得清信，歸鄉里，為某守墳。儻得一虛名係都運與闔生門下，則安矣。²⁴

在另一封信中，商挺為一位李元帥向忽必烈身邊的顧問劉秉忠（1216–1274）尋求舉薦：

四國學院大學文化學會（四国学院大学文化学会），1980 年），頁 51–96；《四國學院大學論集》（四国学院大学論集）第 46 期（1980 年），頁 42–61；第 48 期（1981 年），頁 1–39；及第 49 期（1981 年），頁 11–29；井之崎隆興（井ノ崎隆興）：〈蒙古朝治下の漢人世侯 — 河朔地區與山東地區的兩種型態〉（蒙古朝治下における漢人世侯 — 河朔地区と山東地区の二つの型），《史林》第 37 期（1954 年第 6 期），頁 27–48。

24 王百一丞旨：〈與呂子謙參議〉，《中州啟劄》，卷 1，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4a。

少懇帥府李元帥者，勇而有謀，籌通方略，歷歷可取。今馳傳赴闕，意望吾師一言保奏，想尊意必有所處，餘不待喋喋也。²⁵

在大部分情況下，我們不知道收信人如何閱讀、接收和回覆此類請求。其中一個例外是許衡對楊恭懿（1225–1294）的推薦。在 1250 年代寫給京兆宣撫使廉希憲（1231–1280）的信中，許衡稱：

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²⁶

據姚燧（1238–1313）撰的〈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所記載，「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用楊恭懿，²⁷ 證明許衡的推薦得到了廉希憲的重視。然而楊恭懿卻並沒有接受這個職務。在楊的神道碑中，姚燧謂楊渴望退隱的態度促使他拒絕出仕。²⁸ 儘管我懷疑楊在 1250 年

25 商左山孟卿：〈與寥休國師〉，《中州啟劄》，卷二，同上注，第 116 冊，頁 14 上。

26 許左丞魯齋：〈與廉宣撫〉，《中州啟劄》，卷 2，同上注，第 116 冊，頁 12 下。此書信亦被收錄於許衡的選集內，題為〈與廉宣撫三首〉；見淮建利、陳朝雲編：《許衡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卷九，頁 237。

27 姚燧著：〈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收入查洪德編：《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卷十八，頁 278。

28 同上注。楊恭懿的官方傳記基本上與喪葬碑的記載吻合。見《元朝名臣事略》，頁 13.265；宋濂（1310–1381）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五十一，頁 3841。

代末和 1260 年代需丁憂和其健康狀況欠佳也是可能的解釋。²⁹ 無論如何，與楊恭懿不同的是金元過渡期間的大多數士人都迫切希望找到官僚職位——甚至擔任一向以來被士大夫所鄙視的吏職。³⁰ 1260 年之前士人的仕宦經歷部分證明了這一事實，因為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撰信人和收信人僅僅擔任低級官員或次級官僚職位，一眾士人自金朝滅亡以來經歷了將近三十年的黯淡時光，直至 1260 年忽必烈登基才出現了救贖。通過比較 1260 年之前和之後寫的信件中提到的官職，可見在 1260 年以後撰寫的信中，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門的高級職位比低級官員和次級官僚職位多百分之三十。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書信網絡中的漢族士人在政治上的陞遷。我們可以追溯到《中州啟劄》中 26 位撰信和受信人在 1260 年之前和之後的仕宦變遷，其中 16 位在 1260 年之前僅擔任低級官員和次級官僚職位的人，在 1260 年後成為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門的高級官員。至少有 11 位和 4 位撰信人分別擔任中書省的翰林院士和參政，另有 5 位和 10 位收信人出任同一職務。

自 1260 年大蒙古國建立了日益成熟的官僚體系之後，更多高級職位出現了。然而，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漢族士人將獲得任命。即使漢族士人成功佔據中央政府的關鍵職位，也不表示他們能長期維持其統治地位。這是因為朝廷的權力結構取決於皇帝的政治議程，而這些議程會隨著

29 姚燧：〈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姚燧集》，卷十八，頁 265–66。

30 見 Endicott-West, *Mongolian Rule in China*，頁 105–28 討論了學者—官員如何看待元代的文書人員。

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根據中國大陸學者姚景安的說法，忽必烈需要儒士的才能以鞏固他的權力、促進他的管治。但當政治形勢趨於穩定，忽必烈逐漸感到政治保守的儒士成為他擴張主義政策的障礙。在「金以儒亡」的陰影下，忽必烈開始反對並最終放棄了儒士。³¹ 一些漢族高級官員參與李璫（？-1262）在 1262 年的叛亂是一個關鍵事件，部分解釋了為何忽必烈的態度出現了轉變。³² 此後皇帝越來越依賴西亞和中亞的顧問和官員。與那些主張仁政和對徵收更

31 姚景安：〈忽必烈與儒臣和儒學〉，《中國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90 年），卷一，頁 31-39。

32 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67-79。有關李璫之亂的二次史料，見愛宕松男：〈李璫之亂與其的政治意義：蒙古王朝治下在漢地的封建制與其州縣制的開展〉（李璫の叛亂と其の政治的意義：蒙古朝治下に於ける漢地の封建制とその州縣制への展開），《東洋史研究》第 6 期（1941 年第 4 期）：頁 253-78，重印收入《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卷四，《元朝史》（東京：三一書房，1988 年），頁 175-98；孫克寬：〈元初李璫事變的分析〉，收入《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 44-65；黃寬重：〈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璫父子〉，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6 年），頁 87-106，另有一個修訂版收錄在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2002 年），頁 275-306。關於李璫之亂的英文簡短敘述，見 Morris Rossabi,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s.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頁 424-26; Rossabi, *Khubilai Khan*, 頁 62-67。

高稅額有保留的漢族同僚不同，這些西亞和中亞的理財專家為了資助朝廷的支出以及高昂的軍事行動，會設法把政府的收入擴至最大。考慮到忽必烈政府下不同族群的相對權力，我此前描述 1260 年後漢族士人的政治地位上升主要是與 1260 年前的情況作對比。在書信網絡中有幾個中介人，他們的內部和外部聯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解釋漢族士人在 1260 年以後所起到的政治作用？信中提到的人們是如何在蒙古統治者和漢族士人之間建立聯繫，並促進後者在官場中崛起？以下部分我將會回應這些問題。

四、士人網絡內中介人的內部和外部連接

分析信件中提到的人們，有助揭示漢族士人與蒙古人以及色目人的關係。在排除所有撰信和收件人之後，200 通信的正文中出現了將近 300 個名字（包括全名、部分名稱和縮寫名稱），大約涉及 200 人。幾乎所有這些名字都指向了漢人。與其中一位最常被置書的呂遜關係密切的周惠被提及的次數最多（8 次），其次是廉希憲（4 次）和闊闊（1223–1262）（3 次）。他們是 200 通信中提到的三名蒙古人及色目人的其中之一（信中提到另一個非漢人是忽都魯，由於缺乏資料，其行跡難以追查）。如何解釋廉希憲和闊闊的頻繁出現？仔細研究他們的生活以及與漢族士人的關係，有助了解士人文化如何彌合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三種被蒙古統治者強加的「種族」差異。

廉希憲和闊闊都是忽必烈的家臣，忽必烈在 1244 年

命令兩人在資深儒士王鶚的指導下學習，³³ 故他們很可能是最早接觸儒學的蒙古人。闊闊也曾跟隨另一位儒家學者張德輝（1195–1274）學習。³⁴ 1252年，闊闊被委派到不同的路徵召軍戶。他僅登記擁有強壯男丁和豐富出產的家庭，從而把徵召軍戶對大眾的干擾減到最小。大汗蒙哥十分欣賞闊闊的成就，並命令他監督燕京的匠局。在忽必烈登基後，闊闊在1261年7月被擢升為中書左丞。³⁵ 在中書省任官期間，闊闊似乎與他的漢族同事王惲相處愉快，這可以由後者給闊闊的詩得到證實。³⁶ 闊闊很快被任命為大名路宣慰使，但他在1262年不幸病逝，使我們無法進一步考察他與漢族士人的互動程度。³⁷

廉希憲出生於回紇族，他的父親是拖雷（1192–1232）家族長年的家臣，而拖雷的兒子正是日後的大汗蒙哥和忽必烈。³⁸ 12世紀50年代，廉希憲與忽必烈的關係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前者娶了回紇人孟速思（1206–1267）之女

33 《元史》，卷一三四，頁3250。

34 王惲：〈中堂事記〉，卷三，收入《王惲全集彙校》，卷八十二，頁3413。

35 《元史》，卷一三四，頁3250–3251。

36 王惲：〈上闊闊學士〉，收入《王惲全集彙校》，卷十四，頁600。

37 《元史》，卷一三四，頁3250–51。見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收入《蒙元史新研》，頁95–216，尤其是頁111。

38 以上關於廉希憲生平事跡的敘述，及其與漢族士人的關係，主要採用他的英文傳記，見Hsiao Ch'i-ch'ing, "Lien Hsi-hsien", 收入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頁480–99。另見Michael C. 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頁122–29。

為妻，而孟速思的第二任妻子是忽必烈妻子的妹妹。在廉希憲通過婚姻成為忽必烈的連襟之前，他從青年時代起就師從一位著名的老師學習儒家經典，很快便能總結經典的大義並將其付諸實踐。據記載，廉希憲對經史非常感興趣。他喜歡讀書，以至於書不離手、廢寢忘食。在 1240 年代，某次廉希憲在讀《孟子》時，他被忽必烈召喚，於是他就帶著書去見忽必烈，而後者則詢問他關於孟子（公元前 372–前 289）的教義。他在回答中概述了關於王道、性善、義利，以及仁慈與暴力之間的區別。³⁹20 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垣（1880–1971）將廉希憲歸類為色目人中的儒家，在很大程度上亦歸因於廉對儒家學說的傾向。⁴⁰廉希憲所接受的儒家教育，部分解釋了為甚麼他提名像許衡這樣的著名儒家大師來主理教育事務，並在 1250 年代中期任職京兆宣撫使期間，能與另外兩位漢族士人姚樞（1203–1280）和商挺緊密合作。⁴¹除了善用上述學者的學

39 元明善（1269–1322）：〈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收入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 年），卷二十四，頁 353；《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25；《元史》，卷一二六，頁 3085。

40 Chen Yüan 陳垣,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Yuan Xiyu ren Huahua kao 元西域人華化考)*, trans. and annot. Ch'ien Hsing-hai 錢星海和 L. Carrington Goodrich 譯註 (Los Angeles: Monumenta S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頁 21–23。

41 許左丞魯齋：〈與廉宣撫〉，《中州啟劄》，卷二，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12 下至 13 上；《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24；《元史》，卷一二六，頁 3085；蕭啟慶：《廉希憲》（Lien Hsi-hsien），頁 483。

術和管理才能外，廉希憲還以自己的積蓄在京兆拯救了許多淪為奴隸的漢族士人，並將他們登記為儒戶。⁴² 在 1259 年，當廉希憲隨忽必烈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漢）時，他帶領一百多名儒士在營地前跪拜，要求蒙古王子以公費贖回在宋地被掠為戰俘的士人。忽必烈同意了廉的請求，隨即釋放了超過五百名士人。⁴³ 1260 年，當一位名為李檠的真定名士被不公地囚於獄中時，廉希憲向新登位的忽必烈報告了這一事情，皇帝隨即把無辜的李檠釋放。⁴⁴ 1263 年當廉被召到京師任中書平章政事後，他與一群在中央政府供職的漢族士人共事，當中包括他在京兆的舊同僚商挺和姚樞。他們與阿合馬領導的一批理財專家在朝廷競爭，積極推廣漢法，如恢復監察制度，以及把舉薦全國漢族士人入仕的渠道制度化。⁴⁵ 正如蕭啟慶（1937–2012）簡明扼要地指出，廉希憲「是一位非漢人儒士，在捍衛儒家觀點的過程中首當其衝地受到理財專家的衝擊」。⁴⁶ 可能由於阿合馬的攻訐，廉在 1270 年辭去了中書平章政事的職務返回家鄉。未幾，一些漢族士人乞求皇帝重新起用廉希憲，其中王恽在 1271 年請求讓廉希憲負責四川事務，⁴⁷ 而魏初則於

42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26；《元史》，卷 126，頁 3085；蕭啟慶：《廉希憲》（Lien Hsi-hsien），頁 483。

43 Hsiao Ch'i-ch'ing, "Lien Hsi-hsien", 頁 484；《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26；《元史》，卷一二六，頁 3086。

44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27。

45 Hsiao Ch'i-ch'ing, "Lien Hsi-hsien", 頁 490–91。

46 同上注，頁 480。

47 同上注，頁 493。

1274 年請求把廉希憲召回京師，並起用他在中書任官。⁴⁸ 儘管漢族士人的努力可能因阿合馬的反對而徒勞無功，但卻證實了他們對廉的支持。直到 1278 年，廉希憲終於在另一漢人官員董文忠（1231–1281）的舉薦下重返京師，而董此前曾師事廉的老師王鶚。然而，廉仍未能回到中書省任職，這很可能是由於其健康不佳及阿合馬的持續排斥。⁴⁹ 廉希憲在 1280 年離世，許多士大夫對此感到惋惜。⁵⁰ 很多漢族士人撰寫悼詞與詩悼念廉，當中胡祗遹（1227–1293）、閻復（1236–1312）、侯克中（1225–1315）、姚燧與李元禮等人的作品時至今日仍然存世。⁵¹ 總而言之，廉希憲對漢族士人的同情及其對儒家教義的堅持，部分解釋了為甚麼他即使有回紇背景仍被納入漢族士人網絡之內，這從漢族士人經常在通信中提到廉的名字和為紀念他撰寫的悼詞可以得到證實。不幸的是，在廉希憲現存的幾篇著作中，很難找到他作為交流橋樑連接漢族士人與蒙古精英的確鑿證據。⁵² 儘管如此，廉希憲與在朝廷效力的漢族士人相處融洽，加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親密，表明他在

48 同上注，頁 4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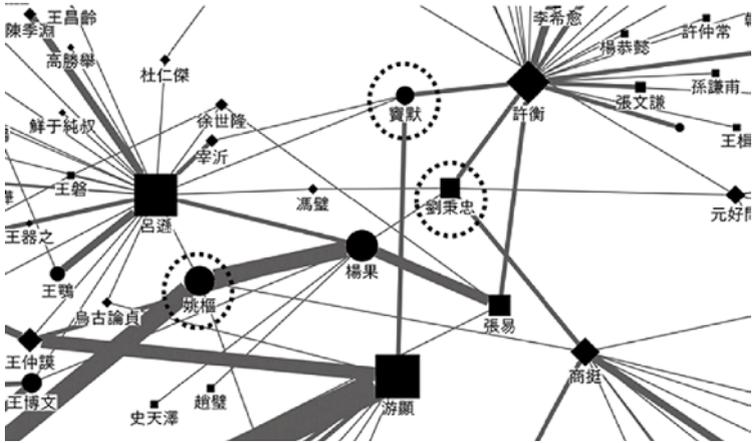
49 同上注，頁 495。

50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頁 142。

51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507。亦見 Hsiao Ch'i-ch'ing, "Lien Hsi-hsien", 頁 496。

52 廉希憲的作品僅有很少尚存於今日。現代彙編《全元文》收錄了 3 篇廉希憲的文章。見《全元文》，卷八，頁 286–90。而最近的彙編《全元詩》（楊鐮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則沒有包含廉的任何詩作，表明了其詩作並未流傳至今日。

聯繫漢士與蒙古精英起到關鍵作用。⁵³ 廉的這一角色對忽必烈招攬漢族士人舉足輕重。



圖表 1 金元過渡時期漢族士人的書信網絡。菱形節點代表撰信人，方形節點代表接收信人，圓形節點代表撰信和收信人。節點的大小和線的粗幼表示發送和 / 接收的書信的数量。中間人用虛線圈出。要訪問和瀏覽包含《中州啟劄》中書信全文和我的網絡數據，請參閱 http://dh.chinese-empires.eu/analysis/ZhongZhouQiZha2/zzqz_table.html

除了廉希憲的聯繫之外，分析書信網絡也是一種探索蒙古人如何招募漢族士人的方法。我把撰發和 / 或收到最多信件的人定義為核心人物。儘管他們之間缺乏直接的書信溝通，但值得注意的是，撰發和 / 或收到 15 封以上信件的 6 個核心人物（即呂遜、游顯、姚樞、許衡、楊果和商挺）均通過 3 個中介人相互聯繫，（見圖表 1）這三個人

⁵³ 見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吾兒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收入《元史論叢》（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卷七，頁 123–36；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頁 122–35，討論了廉希憲家族的婚姻網絡。

是姚樞、劉秉忠、竇默（1196–1280）。他們的社會和政治角色值得學術界關注。他們有一共同經歷：在忽必烈的藩邸擔任顧問。儘管他們與漢族士人的大部分通信都是始於他們加入忽必烈之後，但我們不應將他們在書信網絡中的核心作用僅僅歸因於他們在忽必烈的幕府中服務，因為他們可能在加入忽必烈之前就已經在漢族士人網絡中擔任中介人，儘管這一猜測尚不能證實，因為無法確切知道書信的撰寫年月，且缺乏其他史料佐證。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開始相互聯繫的確切時間仍未可知；因此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以重建網絡作為解釋工具，並推論說，核心中介人的個人關係促進了忽必烈招募漢族士人。例如我們無法把商挺在 1253 年被延攬至忽必烈的幕府歸因於他與劉秉忠和姚樞的聯繫，因為商挺寫給兩人的三通信都是在 1260 年之後寫的。⁵⁴ 事實上通過重建書信網絡只能讓我們知道兩個人通過信件保持聯繫，並促使我們進一步調查他們何時開始有接觸，以及他們在何時才會安心地依靠其通信人作為社會資本。換句話說，經重建的網絡暗示了一些人際關係，可以揭示漢族士人在 1260 年以後晉升的原因。仔細研究這些人際關係——特別是它們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可能有助於確定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解釋忽必烈如何招攬漢族士人。許衡的例子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54 商挺是在 1253 年被招募以協助忽必烈治理關中。見《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頁 218。至於商挺寄給劉秉忠與姚樞的信，見商左山孟卿：〈與姚尚書〉、〈與晦公國師〉與〈與寥休國師〉，《中州啟劄》，卷二，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13 下至 14 上。

我們清楚知道許衡在 1250 年代致信與廉希憲、劉秉忠和竇默，⁵⁵ 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推測許衡與這些忽必烈顧問的親密關係如何促使他後來在 1260 年代升任中書左丞。然而若把這種推理應用到其他撰信人則較困難，因為其他撰信和收信人的文學作品和傳記信息並不像許衡那樣豐富，使我們幾乎無法辨別特定人物何時相遇或開始通信。未能確定書信撰於何時，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重建的書信網絡的解釋能力，特別是在忽必烈如何招攬漢族士人這一方面。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為何忽必烈要招攬漢族士人？

根據官方記載，在 1244 年，忽必烈仍為王子之時便開始招募漢族士人擔任其顧問。⁵⁶ 現有的學術論著通常把忽必烈早期招募漢族士人和後來採用「漢法」歸因於其認可漢族士人治理農耕地區的專業知識、其母親的影響以及其個人經歷和早年對漢文化的認識。⁵⁷ 仔細研究書信網絡

55 許左丞魯齋：〈與竇先生〉、〈與仲晦仲一〉、〈與廉宣撫〉，《中州啟劄》，卷二，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116 冊，頁 8-9、12 下。這些書信亦被收入許衡的文集。見《許衡集》，卷九，頁 223、228、237。我們從許衡的年譜中可大致推斷出書信撰於何時，見鄭士范：〈許魯齋先生年譜〉，重印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第 35 冊，頁 585-654。

56 《元史》，卷四，頁 57。

57 見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頁 264-68；羅茂銳：《忽必烈汗：他的生活與時代》（Khubilai Khan），頁 13；白綱：〈關於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歷史考察〉，《中國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頁 93-107；趙華富：〈論忽必烈「行漢法」的原因〉，《史學月刊》，1985 年第 4 期：頁 22-28；姚景安：〈忽必烈與儒臣和儒學〉，頁 31-39。

中的中間人劉秉忠——一位最早加入忽必烈和侍奉其最久的士人⁵⁸——有助揭示未來大汗對儒家和漢族士人的態度。劉秉忠深諳儒、佛、道的儀式和教誨。他在1230年代出家成為佛教僧人之前，曾與全真道士有著密切的聯繫。⁵⁹ 劉秉忠在1242年跟隨一位名叫海雲（1202–1257）的僧侶覲見忽必烈。⁶⁰ 忽必烈對劉的才華印象深刻，因而把他留下擔任顧問。我們從王磐（1202–1293）撰寫的劉秉忠行狀中得知：

- 58 有關對劉秉忠一生及其對蒙古帝國的貢獻的研究，見葛仁考：《元朝重臣劉秉忠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陳得芝：〈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收入《元史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卷九，頁6–11；Chan Hok-lam 陳學霖，“Liu Ping-chung 劉秉忠 (1216–74): A Buddhist-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 *T'oung Pao* 53.1–3 (1967): 頁98–146。
- 59 張文謙（1217–1283）：〈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謚文貞劉公行狀〉，收入《全元文》，卷一一六，頁282。
- 60 關於對海雲的生涯以及他與忽必烈的相遇的討論，見Jan Yun-hua 冉雲華，“Chinese Buddhism in Ta-tu: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收入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s. Chan Hok-lam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頁384–90；Jan Yun-hua, “Hai-yun”，收入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頁224–42、尤其是頁235–37；Mark Halperin, “Buddhists and Southern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Mongol Era”，收入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Song-Liao-Jin-Yuan (960–1368 AD)*, eds.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Leiden: Brill, 2014), 頁1440–43。

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心腹，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耆宿貴近不得與聞者，悉與公參決焉。⁶¹

徐世隆在一篇祭文中也提到劉秉忠和忽必烈之間的親密關係：「（劉秉忠）早識龍顏，情好日密，話必夜闌。」⁶²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皇后（1227–1281）謂「（劉秉忠）言則帝聽」。⁶³ 的評語也證明了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劉秉忠之所以能吸引到蒙古王子的注意乃是因其所擁有的特殊技能，而非其對不同流派經典教義的了解。⁶⁴ 事實上，劉秉忠並非首位因其專精占卜和天文學而獲蒙古統治精英垂青的漢族士人。在數十年前，首任蒙古大汗——成吉思汗（1162–1227，在位 1206–1227）——便因為學識淵博的契丹學者耶律楚材（1190–1244）擁有這些技能而錄用他成為顧問。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書信網絡中幾個核心人物和中介人也擁有專業知識。我們知道許衡在專注於儒家教義之前便已通曉醫學、占卜、數學和水利，⁶⁶ 而

61 王磐：〈劉太保碑銘並序〉，收入《全元文》，卷二，頁 300。

62 徐世隆：〈祭太保劉公文〉，同上注，卷二，頁 399。

63 《元史》，卷一一四，頁 2871。

64 張文謙：〈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謚文貞劉公行狀〉，收入《全元文》，卷八，頁 284。

65 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 181。

66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收入《姚燧集》，卷十五，頁 216。

竇默則是一名擅長針灸的醫師。⁶⁷ 書信網絡中的漢族士人對專業技能的共同興趣，可能不單促進了他們之間的聯繫，亦引起了蒙古統治者對他們的關注。無論如何，劉秉忠是其中一名向忽必烈推薦儒學的早期顧問之一，最重要的是他成功說服未來的皇帝招募儒士。事實上，書信網絡中的大多數漢族士人，是因與劉秉忠的直接或間接聯繫而跟隨忽必烈。例如其中一位主要的中介人竇默就是通過李德輝（1218–1280）的舉薦而成為忽必烈的下屬，而李此前曾獲劉秉忠推薦；⁶⁸ 另一位重要中介人姚樞也是在竇默的推薦下加入了忽必烈的幕府。⁶⁹

儘管越來越多的漢族士人通過劉秉忠的關係擔任忽必烈的顧問，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蒙古王子會為他們分配行政職責——更不用說在1260年之後任命他們到政府的關鍵職位。事實上，為了獲得蒙古王子的青睞，漢族士人需要與其他來自西亞和中亞的顧問競爭。⁷⁰ 我認為，大汗蒙

67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頁151。

68 同上注，卷十一，頁213。

69 同上注，卷八，頁152。

70 見蕭啟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北：臺大文學院，1966年）；李符桐：〈畏兀兒人對於元朝建國之貢獻〉，收入《李符桐論著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3，頁271–338與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04–6 有關於西方和中亞精英對元朝政治影響的一般概述。對元代「雜類」下特定民族進行的研究，見 Morris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和 Herbert Franke, “Tibetans in Yuan China”，收入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哥在 1250 年代發起的行政和財政改革對漢族士人的命運至關重要。為了在龐大的陸上帝國內有效地動員人力和自然資源，大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完成以下目標：（1）限制和平衡在帝國內農耕子民所承受的負擔；（2）在王公貴族的封地內重申皇帝的權威；（3）在活躍戰區減少破壞和人口分散；（4）在以前遭受破壞的地區恢復經濟活力。⁷¹ 有趣的是蒙哥大汗的改革計劃與此前漢族士人顧問的提案頗相似。劉秉忠在 1249 年向忽必烈提出的萬言策中強調「尊主庇民」的重要性。⁷²「正朝廷，振紀綱」有助於實現前者，⁷³ 而後者則可以通過減稅和向大眾發還貸款來實現。⁷⁴ 姚樞在 1250 年第一次見到忽必烈後，也提出了類似

ed. John D. Langlo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頁 257–95 和 296–328; Thomas T. Allsen,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與 Igor de Rachewiltz,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收入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ed. Morris Rossab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頁 243–80 和 頁 281–310; Michael C. 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71 Allsen, *Mongol Imperialism*, 頁 85。

72 張文謙：〈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謚文貞劉公行狀〉，收入《全元文》，卷八，頁 283；王磐：〈劉太保碑銘並序〉，同上注，卷二，頁 299。

73 同上注，卷八，頁 283。

74 對於劉秉忠在 1249 年提交給忽必烈的完整提案，見《元史》，卷一五七，頁 3688–92。見 Chan Hok-lam, “Liu Ping-chung 劉秉忠 (1216–74)”，頁 119–22 是部分的英文翻譯和提案摘要。

的建議。姚不僅提議在中書省下設立行政部門以確保政策執行的一致性，而且還要修改法律制度，讓朝廷掌有執法權力，使封建王侯不再擁有懲罰其子民的特權，大汗的權威因而得到加強。姚樞隨後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減少稅收和徵用民力，鼓勵農業生產以及引入福利和救濟措施以恢復經濟繁榮。⁷⁵ 從這個角度來看，建立公民秩序的共同願景似乎為非漢族征服者和漢族士人之間提供了一個共同點，正如包弼德曾指出，此前女真人在採用漢法的同時亦維護他們獨特的民族認同。⁷⁶

蒙哥的大戰略與漢族士人提議之間的高度一致性，可以解釋為何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委託儒家學者執行行政任務。忽必烈在其封地邢州的良好管治，以及他成功解決兄長蒙哥的爭執，只是漢族士人證明能力的其中兩個例子，⁷⁷ 為漢族士人在 1260 年後的政治陞遷奠定了基礎。忽必烈在 1260 年登基之後，此前曾受蒙古王子庇蔭的 14 位漢族士人中的 12 人得到了拔擢：8 人成了中書省的參議、亦有 4 人成了翰林院士。因此，漢族士人網絡的一部分轉化為一個本土政治精英網絡。

相較於忽必烈的支持態度，漢族士人之間的相互支持

75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頁 157–58。

76 Peter K.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7 年第 2 期，頁 461–538。

77 有關漢族謀臣對忽必烈貢獻的討論，見 Rossabi, *Khubilai Khan*，頁 22–52。對於忽必烈與其兄弟蒙哥的關係，見同書頁 34–36 和 Allsen, *Mongol Imperialism*，頁 50–51。

對他們在 1260 年後的政治成功也至關重要。如上所述，漢族士人在通信中極力舉薦其親友任官，可見他們普遍有一個共同的願景：這可能源於儒家的「外王」概念。他們希望把其所學應用於政治領域，並以維護漢文化價值和恢復傳統的治國模式為最終目標。除了建立中央集權的體制外，一些漢族士人還建議恢復科舉考試，這可能基於他們認為科舉可為漢族士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然而，漢族士人對於考試內容的分歧卻延遲了科舉的恢復。⁷⁸ 這種分歧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說明書信網絡中的漢族士人並非一個連貫的整體。

事實上，漢族士人群體當中的差別之一是他們不同的學術取向，而這起源於北宋時期（960–1127）對儒學的兩種不同演繹：蘇軾倡導的文化追求和程頤（1033–1107）主張的道德修養。諸如趙秉文等金朝晚年的學者，便試圖通過把兩派納入一個更廣泛的儒學定義來調和兩派之間的

78 許多前金進士，如王鶚和徒單公履，曾在 1260 和 1270 年代主張恢復科舉考試。然而，那些堅持程頤和朱熹教義的學者對這些建議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復辟科舉會導致對文學導向研究的偏見，並成為他們熱切斷言的經典研究和道德修養的威脅。見《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三，頁 266–67；《元史》，卷五十一，頁 3842；Lam Yuan-chu 劉元珠，“On Yuan Examination System: The Role of Northern Ch’eng-chu Pioneering Scholars,”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1985 年），頁 197–203。另外，見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其《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頁 1–58；安部健夫：〈元代知識人と科挙〉，《史林》1959 年第 6 期，頁 113–52 與 Rossabi, *Khubilai Khan*，頁 70–71 討論了重開科舉的辯論。

差異。儘管有趙秉文等人的嘗試，但學者對儒學的演繹在金朝滅亡之後又出現了不一致，並形成了兩個獨特的知識分子群體。⁷⁹ 由文學家組成的文化主義群體模仿蘇軾的文化追求風格，強調文學的美感。這個群體偏愛奢侈的生活方式，他們經常舉辦酒會，參與社交聚會和展現文學才華。相比之下，另一群所謂道德主義的學者堅持程頤的理學，強調通過教育和學習儒家經典來完善道德行為。⁸⁰

日本歷史學家安部健夫（1903–1959）曾指出，兩個知識分子群體各自遵循自己的發展歷程而且互不干涉。然而呂遜的書信網絡揭示了兩個知識分子群體確實通過中介人很好地聯繫在一起。呂遜和文化主義群體中的王鶚、勾龍瀛、徒單公履、康擘、杜仁傑（1208–1290）、王磐、徐世隆等有關連。與此同時，他也收到了郝經（1223–1275）、⁸¹

79 Bol, “Seeking Common Ground”, 頁 461–538;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onfucianism under the Chin and the Impact of Sung Confucian Tao-hsüeh”, 收入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ds.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Stephen H. Wes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頁 71–114; 與 Ong Chang Woei, “Confucian Thoughts”, 收入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頁 1404–06、1421–24。

80 安部：〈元代知識人與科舉〉，頁 113–52；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頁 155–56。

81 關於郝經的知識取向如何融合到南宋理學道德家朱熹的最近研究，見 Christian Soffel and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 Zhongyong 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2), 頁 111–88。

竇默和姚樞等道德主義群體的來信。呂遜之所以能成為中間人角色，很可能是由於兩個知識分子群體並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實上，道德修養也是文化主義群體中人的一個主要關注點，而道德主義群體中人也表達了他們對詩歌創作的興趣。王鶚和王磐兩人都是文化主義群體的領袖；然而前者教導學生以「窮理」為先，後者則不停地閱讀宋代道學家程頤和朱熹（1130–1200）等人的著作。⁸² 相反，像許衡和郝經這些道德主義群體中人的文集中也收入了許多詩和賦。⁸³ 最重要的是，文化主義和道德主義群體均認為有必要建立文治秩序。這一共通點不僅使呂遜能夠彌合這兩個群體，而且還促進了漢族士人網絡的凝聚力，儘管網絡成員的知識取向不盡相同。除了將漢族士人的相互支持和集體行動歸因於他們在金元過渡期間曾一起經歷社會和政治動盪外，在爭奪蒙古霸主的恩寵期間，面對色目精英的挑戰也有助團結漢族士人。⁸⁴

本文討論的書信網絡展示了士人如何通過書面通信相互聯繫，這有助於塑造網絡中不同族群的士人身份。在

82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頁 240、246。

83 見《許衡集》，卷十一，頁 252–77；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15.1–237。有關郝經文學的近期學術研究列表，見 Christian Soffel and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頁 24，注 26。

84 見蕭啟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有對被歸為「雜類」下的精英對元代政治影響的一般性調查。

這裡，蕭啟慶提倡的「士人化」概念有助我們了解這一現象。「士人化」是指那些具有非漢族背景但採用漢族士人文化的人。與那些放棄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以及被漢人傳統同化的「漢化」人不同，「士人化」的非漢族人可以選擇性地保留對自己有利的文化、種族和政治身份。⁸⁵ 雖然書信網絡主要由漢族士人組成，但它並不是自我封閉的；相反，它對廣泛意義上與士人文化有關的人開放——無論其人的種族或宗教背景如何。蒙古族的闊闊和回紇族的廉希憲，或者像海雲和木庵這樣的佛教僧侶均被納入網絡之中。儘管上述四人均已「士人化」，但闊闊和廉希憲仍保留了獨特的民族和政治身份，而海雲和木庵則保留了他們的宗教身份。我認為這種共享的士人身份加強了網絡中人的內在凝聚力，從而提高了他們在 1260 年後的地位。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州啟劄》所收的 200 通信中，沒有一封是寄予道士的，只有一通信是由一位佛教僧人寫給另一位佛教僧人的。宗教人士在金元之際是有影響力的社會精英，然而他們似乎被本文討論的漢族士人網絡

85 有關「士人化」與「中國化」差異的討論，見蕭啟慶：〈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士人化〉，收入《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頁 55-84。對於「士人化」如何促進不同民族類型的士人互動，以及他們在元代形成各種社會關係，詳細研究見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

邊緣化了。⁸⁶ 這種明顯的邊緣化可能是源自史料的偏頗。雖然《中州啟劄》所收的 200 通信已大致囊括了華北地區漢族士人在 1230 到 1290 年之間所寫的書信件，⁸⁷ 但它們只是眾多可以揭示人際關係的文體之一，故我們還應考慮其他諸如詩歌、序跋、墓誌銘等作品。⁸⁸ 此外，飯山知保的著作指出碑刻和拓片等材料有時候也會揭示相關人等的社交網絡。⁸⁹

86 對於有影響力的宗教團體如全真教、漢傳佛教徒與藏傳佛教徒在蒙古治下的 13 世紀中國的研究，見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Pierre Marsone, “Daoism under the Jurchen Jin Dynasty”，收入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頁 1126–29；Sechin Jagchid, “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during the Mongolian Rule of China,” *Mongolian Studies*, 6 (1980 年)：頁 61–98；Jan Yun-hua, “Chinese Buddhism in Ta-tu”，頁 375–417；野上俊靜：《元史釋老傳研究》（元史釈老伝研究）（京都：野上俊靜博士頌壽記念刊行會，1978 年）；胡其德：《蒙元帝國初期的政教關係》（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87 基於對《中州啟劄》收錄的所有信件的粗略調查和兩個現代彙編，《全遼金文》（閻鳳梧主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與《全元文》，我們可以識別出共約 270 封由華北士人在十三世紀寫的書信。因此，《中州啟劄》佔所有現存信件的百分之七十五。

88 例如 Chen Wen-yi,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與 “Social Writing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The Recipients of Prefaces by Jizhou and Mingzhou Writers” (paper presented at Prosopography of Middle Period China: Using the Database, Warwick University, Coventry, England, December 13–16, 2007).

89 見飯山知保：《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另一個「士人層」》（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 年）。

最理想的情況是我們能夠參考上述所有可資引用的材料，以重建金元過渡期一個完整的精英網絡。事實上，書信網絡中的漢族士人與華北地區有影響力的道教派別之間有著密切聯繫，這從前者紀念全真教道士和道觀的作品中可以得到證實。在這些作品中，楊奐（1186–1255）、王鶚和徒單公履等士人形容他們與其道教友人均有著通過政治參與改變世界這一共同願景。⁹⁰ 元代儒學、道教和佛教的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三教信眾之間的思想交流。⁹¹ 我懷疑像劉秉忠這些精通三教教義的人，在聯繫漢族士人網絡與全真道教以外的其他著名宗教團體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統治者與這個由政治和社會精英交織而成的網絡合作，我認為對於其在 13 世紀治理華北至關重要，而要驗證這一假設則需要對蒙古時期的精英網絡進行廣泛的研究。

90 有關於漢族士人在金元過渡時期如何描述全真教運動的研究，見 Florian C. Reiter, “A Chinese Patriot’s Concern with Taoism: The Case of Wang O (1190–1273),” *Oriens Extremus*, 33.2 (1990 年)，頁 95–131；Ong Chang Woei,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頁 103–5、108–9；Wang Jinping,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頁 72–88；Mark Halperin, “Accounts of Perfection in a Flawed World: 13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i and Quanzhen Taoism” (paper presented in the panel “Being Imperial in the East, II: Frontiers, Groups, and Centres in East Asian Empire” at Leeds 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 2014, University of Leeds, England, July 10, 2014)。

91 Liu Ts’un-yan 柳存仁,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Sung-Yuan China”，收入其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J. Brill, 1984)，頁 54–95；Liu Ts’un-yan and Judith Berling, “The ‘Three Teachings’ in the Mongol-Yüan Period”，收入 *Yüan Thought*，頁 479–512。

五、餘論

本文以《中州啟劄》所收的 200 通書信為基礎，重構了金元過渡時期漢族士人的書信網絡，證明身處華北不同地區的士人如何通過書信保持聯繫。書信網絡的空間分布隨著士人的移動改變；而士人的移動可能與其任職不同崗位有關。儘管士人在金朝滅亡後失去了作為統治精英的尊貴身份，但他們通過在漢人世侯的幕府中擔任文職，以另一種方式實踐他們渴求出仕的願景。士人的堅持似乎得到了回報，書信網絡中有相當部分的士人在 1260 年忽必烈登基後被納入蒙古的官僚體系，並重新獲得統治精英的地位。

仔細考察漢族士人的書信網絡，發現他們在 1260 年後的政治升遷在某種程度上受益於一位名叫廉希憲的回紇人。作為忽必烈的長期家臣和儒家的擁護者，廉希憲的背景表明他是漢族士人與蒙古和色目統治精英之間的溝通橋樑。此外，竇默、劉秉忠、姚樞這三名中介人與書信網絡中的六名核心成員有關，故他們與未來大汗忽必烈的關係對漢族士人的命運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劉秉忠的角色至關重要。早於 1240 年代已為忽必烈効力的劉秉忠，在蒙古王子幕下的漢族士人中服務時間最長。他通過其社交網絡向蒙古王子推薦漢族士人。在忽必烈的庇蔭下，一些漢族士人後來被委派行政任務，部分原因是他們的建議符合蒙哥大汗的大戰略。忽必烈對漢族士人的專業表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為他們在 1260 年後日益增長的政治力量奠

定了基礎。

上述結論對元代歷史研究者而言可能並不陌生。然而這種網絡分析的嘗試與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同：重建漢族士人關係糾結的網絡揭示了我們此前可能未有覺察到的模式或證據。網絡分析使我們發現了一些把華北不同地區與不同學術取向的士人聯繫起來的溝通橋樑，從而讓這些不同的士人個體形成了對漢族文化的認同。書信網絡的重構為 1260 年後漢族士人政治地位的上升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儘管它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本論文也探討了幾個關鍵中介人如何徵求忽必烈贊助網絡內部的一些漢族士人，發現忽必烈登基後，與三位中介人關係密切的漢族士人在蒙古政府中擔任了重要職務。自此以後，他們變成了一個由本土政治精英組成的網絡。這些政治精英成功說服蒙古統治者遵循蒙哥大汗的一些重大戰略，繼續採取漢法進行治理，從而促進蒙古在北部地區的治理。除了研究精英網絡如何影響蒙古在 13 世紀的統治之外，也可窺見在中國內的這種網絡與伊兒和金帳等蒙古汗國內精英網絡之間的關係。對蒙古帝國內的精英網絡進行比較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闡明蒙古霸主的統治原則？這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書目

- 丁立中編：《八千卷樓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 傅增湘著，傅熹年編：《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第二教正版。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6年。
- 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黃丕烈著，潘祖蔭輯，周少川點校：《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
- 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重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繆荃孫、吳昌綬、董康撰，吳格整理點校：《嘉業堂藏書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重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閻鳳梧主編：《全遼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4年。
- 靜嘉堂文庫編：《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靜嘉堂文庫，1930年。
- 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楊亮、鍾彥飛編：《王惲全集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劉應李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重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
- 淮建利、陳朝雲點校：《許衡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重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 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葉盛：《菴竹堂書目》，重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
- 永瑢、紀昀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狄寶心編註：《元好問文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宋濂主編：《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張金吾著，馮惠民編：《愛日精廬藏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鄭士范：《許魯齋先生年譜》，重印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吳弘道編：《中州啟劄》，清手稿版本，重印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 ：《愛日精廬》，手稿版本，重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
- 朱睦㮮：《萬卷堂書目》，重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安部健夫：〈元代知識人與科舉〉（元代知識人と科挙），《史林》1959年第42卷第6號，頁113–52。
- Allsen, Thomas T.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243–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 *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Aubin, Françoise. “The Rebirth of Chinese Rule in Times of Trouble: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Thirteenth Century,” in *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S.R. Schram, 113–46.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 白綱，〈關於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歷史考察〉，《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頁93–107。
- Biran, Michal. “The Mongo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eppe to Eurasian Empire.” *Medieval Encounters* 10, nos. 1–3 (2004): 339–61.

- Bol, Peter K.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no. 2 (1987): 461–538.
- Brose, Michael C.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 W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 Chan Hok-lam 陳學霖. "Liu Ping-chung 劉秉忠 (1216–74): A Buddhist-Taoist Statesman at the Court of Khubilai Khan." *T'oung Pao* 53, nos. 1–3 (1967): 98–146。
- 陳得芝：〈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收入《元史論叢》9，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頁1–22。
- Chen Wen-yi 陳雯怡.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 . "Social Writing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The Recipients of Prefaces by Jizhou and Mingzhou Writers." Paper presented at Prosopography of Middle Period China: Using the Database, Warwick University, Coventry, England, December 13–16, 2007.
- Chen Yuan 陳垣.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Yuan Xiyu ren Huahua kao 元西域人華化考)*.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 'ien Hsing-hai 錢星海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Los Angeles: Monumenta S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 鄭素春：《全真教與大蒙古國帝室》。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 De Rachewiltz, Igor. “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Mongol Perio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9, no. 1 (1966): 88–144.
- .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281–31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Egan, Ronald C. “Su Shih’s ‘Notes’ as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ourc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 2 (1990): 561–88.
- . “Su Shi’s Informal Letters in Literature and Life.” In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Edited by Antje Richter, 475–507. Leiden: Brill, 2015. Endicott-West, Elizabeth. *Mongolian Rule in China: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 Farquhar, David 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1990.
- Franke, Herbert. “Tibetans in Yuan China.”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296–32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From Tribal Chieftain to Universal Emperor and Go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In *Herbert Frank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4–85. Brookfield, VT: Variorum, 1994.

葛仁考：《元朝重臣劉秉忠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Halperin, Mark. “Accounts of Perfection in a Flawed World: 13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i and Quanzhen Taoism.” Paper presented in the panel “Being Imperial in the East, II: Frontiers, Groups, and Centres in East Asian Empire” at Leeds International Medieval Congress 2014, University of Leeds, England, July 10, 2014.

———. “Buddhists and Southern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Mongol Era.” In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Song-Liao-Jin-Yuan (960–1368 AD)*.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1433–92. Leiden: Brill, 2014.

韓儒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蕭啟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北：臺大文學院，1966年。

———：〈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元代史新探》，頁1–5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忽必烈「潛邸舊侶」考〉。收入蕭啟慶：《元代史新探》，頁263–30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

- ：〈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 — 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頁 213–77。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年。重印收入蕭啟慶：《蒙元史新研》，頁 265–348。臺北：允晨文化，1994 年。
- 。“Lien Hsi-hsien.”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ited by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480–9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 ：〈元代蒙古人的漢學〉。收入蕭啟慶：《元代史新探》，頁 95–216。臺北：允晨文化，1994 年。
- ：〈論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漢化與土人化〉。《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頁 55–84。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
-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
- 胡其德：《蒙元帝國初期的政教關係》。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 黃寬重：〈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 — 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壇父子〉。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 87–1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6 年。另有一個修訂版收錄在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頁 275–306。臺北：東大圖書，2002 年。

- 黃裳：《翠墨集》。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
- ：《來燕榭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劫餘古豔 — 來燕榭書跋手跡輯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 飯山知保：《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另一個「士人層」》（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举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年。
- 池內功：〈蒙古的金國經略與漢人世侯的成立〉（モゴルの金国経略と漢人世侯の成立）。第1-4部分收入岡本三夫編：四國學院大學創立30周年記念論文集（四国学院大学創立30周年記念論文集），頁51-96。善通寺市：四國學院大學文化學會（四国学院大学文化学会），1980年；《四國學院大學論集》（四国学院大学論集）第46期（1980年），頁42-61；第48期（1981年），頁1-39；及第49期（1981年），頁11-29。
- 井之崎隆興（井ノ崎隆興）：〈蒙古朝治下的漢人世侯 — 河朔地區與山東地區的兩種型態〉（蒙古朝治下における漢人世侯 — 河朔地区と山東地区の二つの型）。《史林》1954年第37卷第6號，頁27-48。
-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 Jagchid, Sechin. "Chinese Buddhism and Taoism during the Mongolian Rule of China." *Mongolian Studies* 6 (1980): 61-98.

Jan Yun-hua 冉雲華 . “Chinese Buddhism in Ta-tu: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In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ited by Chan Hok-lam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375–4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ai-yun.” 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ited by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 224–4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

Lam Yuan-chu 劉元珠 . “On Yuan Examination System: The Role of Northern Ch’eng-chu Pioneering Scholars.”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 197–203.

李符桐：〈畏兀兒人對於元朝建國之貢獻〉，收入《李符桐論著全集》3，頁 271–33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柳存仁 (Liu Ts’un-yan)：〈宋 — 元中國三教的融合〉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Sung- Yuan China)。收入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頁 3–95。萊頓：E. J. 布里爾，1984 年。

———. “The Syncretism of the Three Teachings in Sung Yuan China.” In Liu Ts’un-yan. *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3–95. Leiden: E.J. Brill, 1984.

——— and Judith Berling. “The ‘Three Teachings’ in the Mongol-Yuan Period.” In *Yuan Thought: 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 Edited by Chan Hok-lam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479–51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Makino, Shuji 牧野修二. “Transformation of the shih-jen 士人在 the late Chin 金 and early Yuan 元.” *Acta Asiatica* 45 (1983): 1–26.

Marsone, Pierre. “Daoism under the Jurchen Jin Dynasty.” In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Song-Liao-Jin-Yuan (960–1368 AD)*.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1111–59. Leiden: Brill, 2014.

Morgan, David. *The Mongols*. Oxford: Blackwell, 1986.

野上俊靜：《元史釋老傳研究》（元史釋老傳研究）。京都：野上俊靜博士頌壽記念刊行會，1978年。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Edited by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Ong Chang Woei 王昌偉. *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Confucian Thoughts.” In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 Song-Liao-Jin-Yuan (960–1368 AD)*.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and Pierre Marsone, 1378–1432. Leiden: Brill, 2014.

愛宕松男：〈李璿的叛亂與其政治意義：蒙古朝治下於漢地的封建制及其州縣制的展開〉（李璿の叛亂と其の政治的意義：蒙古朝治下に於ける漢地の封建制と

その州縣制への展開)。《東洋史研究》1941年第6卷第4號，頁253-78。重印收入《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四冊，《元朝史》，頁175-98。東京：三一書房，1988年。

Reiter, Florian C. “A Chinese Patriot’s Concern with Taoism: The Case of Wang O (1190–1273).” *Oriens Extremus* 33, no. 2 (1990): 95–131.

Rossabi, Morris.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ited by John D. Langlois, 257–9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6. 414–89.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aunders, John Joseph. “The Nomad as Empire-Builder: A Comparison of the Arab and Mongol Conquests.” In *Muslims and Mongols*, 36–66. Edited by G. W. Rice. Christchurch: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77.

Soffel, Christian and Tillman, Hoyt Cleveland. *Cultur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Exploring Issues with the Zhongyong and the Daotong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2, 111–88.

-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孫克寬：《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年。
- ：〈元初李壇事變的分析〉。收入孫克寬：《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頁44–65。臺北：文星書店，1958年。
- ：《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 孫楷第：《元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Tillman, Hoyt Cleveland. “Confucianism under the Chin and the Impact of Sung Confucian Tao-hsüeh.” In *China under Jurchen Rule: Essays on Chi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nd Stephen H. West, 71–114.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 Tsui Lik Hang 徐力恆. “How Do You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an Epitaph? A Case Study in Epistol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terati Official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tudies of China’s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during 10th–13th centuries China-cum-the 3r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ong Studies Group for the Lingnan Region”

十至十三世紀中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學術研討會暨嶺南宋史研究會第三屆年會。香港：嶺南大學，2012年12月9日。

———. “Bureaucratic Influences on Letters in Middle Period China: Observations from Manuscript Letters and Literati Discourse.” In *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Edited by Antje Richter, 363–97. Leiden: Brill, 2015.

Wang Jinping 王錦萍. “Between Family and State: Networks of Literati, Clergy, and Villagers in Shanxi, North China, 1200–1400.” Ph.D.diss. Yale University, 2011.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reasured Canon of the Mysterious Capital in North China under Mongol-Yuan Rule.”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4, no. 1 (2014): 1–35.

王梅堂：〈元代內遷畏吾兒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收入《元史論叢》7，頁123–36。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王慶生：《金代文學家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

溫海清：《畫境中州：金元之際華北行政建置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姚景安：〈忽必烈與儒臣和儒學〉。《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1期，頁31–39。

-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雒竹筠，李新乾編：《元史藝文志輯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 趙華富：《論忽必烈「行漢法」的原因》。《史學月刊》1985年第4期，頁22-28。
- 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